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传教士与法国
早期汉学

〔中〕 阎守诚 / 编
〔中〕 阎宗临 / 著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YSC
6
K2

传教士与法国 早期汉学

[中] 阎守诚 / 编
[中] 阎宗临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490609



110758 111

赠
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 阎宗临著; 阎守诚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9

(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任继愈主编)

ISBN 7-5347-3027-9

I. 传... II. ①阎... ②阎... III. ①中法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清代—文集 ②汉学—研究—法国
IV. ① K249.03-53 ②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715 号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著 者 阎宗临
特约编辑 陈 铮
责任编辑 张 锐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张 胜 陈凤丽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版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61 千字
印 数 1—4 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 顾问：陈乃芳 (Chen Naifang) 陈翰生 (Chen Hansheng)
季羨林 (Ji Xianlin) 李学勤 (Li Xueqin)
饶宗颐 (Rao Zongyi) 汤一介 (Tang Yijie)
王元化 (Wang Yuanhua)
- 主编：任继愈 (Ren Jiyu)
- 执行主编：张西平 (Zhang Xiping)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耿昇 (Geng Sheng) 杨煦生 (Yang Xusheng)
编委：柴剑虹 (Chai Jianhong) 程裕祯 (Cheng Yuzhen)
高建平 (Gao Jianping) 何其莘 (He Qishen)
李明滨 (Li Mingbin) 孟华 (Meng Hua)
任大援 (Ren Dayuan) 黄勃 (Huang Bo)
吴隽深 (Wu Junshen) 谢方 (Xie Fang)
严安生 (Yan Ansheng) 阎纯德 (Yan Chunde)
严绍望 (Yan Shaotang) 杨保筠 (Yang Baoyun)
张德鑫 (Zhang Dexi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周发祥 (Zhou Faxiang) 汪前进 (Wang Qianjin)
- 国际编委：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柳存仁 (Liu Ts'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阎宗临先生

1937 年摄于英国剑桥

序

孙子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谋攻之要道，知胜之枢机也。治学之道，亦何以异是。西方之言学，其考论吾华文字史事者号曰汉学，以西方之人而热心究远东之事，盖彼欲有知于我，此学之涉于“知彼”者也。返视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学彼邦，略涉藩篱，归国而后，弃同敝屣，多返而治汉学，稍为“知己”之谋，辄以兼通东、西自诩，实则往往两无所知，其不每战不败者几希？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然而也。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殁谢，论者深惜之。哲嗣守诚世兄顷来书谓经已彙集先生遗书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后人，为之大喜过望。不揣固陋，略序其耑，为陈“知彼”之学之重要，得先生书以启迪来学，使人知不能以“知己”为满足，而无视于“知彼”，则不免流于一胜一负。庶几欲求操胜算者，不至于南辕而北辙；则吾文之作或为不虚，亦可稍慰先生于地下也乎。

丙子春饶宗颐于香港

编者的话

这本书是汇集我父亲阎宗临在1936年至1943年间发表的关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文而编成的。这些论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中国对法国18世纪的影响;第二部分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对古代和近代中西交通的概述,对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使节的活动也有所探讨。

我的父亲阎宗临生于1904年6月18日,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人。七岁入村中小学,因家境困难,常参加劳动,种过地,背过煤,靠半工半读读完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借了点钱,来到北京。次年,在朋友们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曾做过勤杂工、油漆工以及实验室助理员。在做工时,节衣缩食,有了一点积蓄。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主要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主持中国文化讲座,与此同时,在该校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毅然辞去伏利堡大学的教职,和我母亲梁佩云一同回国,共赴国难。抗战期间,父亲先后在广西大学、无锡国专、昭平中学及桂林师院任教。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于1948年至1950年兼任历史系主任。

1950年8月,父亲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回故乡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工作,直至1978年10月5日逝世,终年75岁。

父亲逝世二十周年,1998年9月我编的《阎宗临史学文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其中关于传教士和中西交通的几篇文章引起国内从事汉学、清史研究的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出版经费的限制,该书印数很少,难以买到,且字数有限,收录的论文并不完整。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建议我将父亲有关传教士的文章收集齐全,再编一本书,他认为这些文章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我国汉学研究史上也有学术史的意义。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编成了这本书。

父亲在大学任教四十余年,主要教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但中西交通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他对传教士的研究,始于在伏利堡大学研究院作学位论文时。他的博士论文所以选择《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为题,我想有如下原因:

首先,父亲的大学教育是在欧洲接受的,受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较深。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地缘、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父亲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他认为,世界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肌体,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来补充,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健康的、进步的和完美的。因此,他很重视对各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其次,父亲在伏利堡大学读书时,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该校教授岱梧(E. Devaud)的赏识,认为他是这个学校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岱梧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指导父亲的学习,关心他的生活,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从而使父亲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在校期间,父亲信仰了天主教(回国后不再参加宗教活动),选修了拉丁文,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艰深的文字。父亲对天主教的理论、文献及教义教规都有深入的

了解,他对传教士的活动有兴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复次,父亲受于斌的一些影响。在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他曾到罗马参观,偶然邂逅了在梵蒂冈学神学的于斌,异国相识,格外亲切。于斌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烧水泡茶,相谈甚欢。1933年,父亲回国探亲,在北京又见到于斌。当于斌得知他已获得文学硕士,学了三年拉丁文,很热情地鼓励他再学点希腊文,专治宗教史,将来可以到辅仁大学任教。父亲回到瑞士后,虽然没有学希腊文,却选定了有关宗教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和这次谈话有关的。于斌一直从事宗教活动,据说后来成为台湾教区的红衣主教。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父亲曾七次到罗马,在梵蒂冈查阅教廷档案,并曾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严谨的学风,新颖的论点,扎实的功力,丰富的材料,使其论文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不仅顺利通过答辩,取得学位,而且在欧洲汉学界也获得好评。本书首次收录了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全译本。

父亲回国时,原计划取道上海,并把在欧洲多年收集的图书资料装成五大箱运往上海,但“八·一三”日军炮击闸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到上海的船停开了,只好改道香港。先前运往上海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这对父亲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回国后,1939年至1943年,父亲在广西大学任专任教授,讲授《世界通史》。我们家住在桂林施家园,父亲每周到西大所在地良丰住三天,课毕再回桂林。当时,广西大学的研究条件还好,图书馆有必备的参考书,父亲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夜以继日进行研究工作,出版了《近代欧洲文化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本书所收论文,除《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外,都写作于这一时期。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攻桂林,父亲带领全家同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师生一起逃难。此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多方面的原因,使父亲对传教士的有关研究难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时,有一天,父亲在谈话中对我说:“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

聊天的人也没有。”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只是父亲溢于言表的抑郁之情,深深地印在我心中。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想:父亲这样说,既不是自谦,也不是自责,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宽松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交流切磋,他在东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活动等熟悉领域中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父亲这句话里,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慨叹,神情才那样抑郁。

其实,父亲在中西交通史这一研究领域中,是有筚路蓝缕、辛勤开创之功的。他是最早对杜赫德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发现并介绍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樊守义的《身见录》;他对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有许多重要发现。这些发现都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得益于他在巴黎、剑桥、梵蒂冈、布鲁塞尔等地图书馆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父亲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日文也懂一点,因而能见到外国学者容易忽视、中国学者难以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的资料。所以,他在六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其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至今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收录的论文,主要发表在《扫荡报》文史地副刊、昆明《益世报》及《建设研究》等报刊杂志上。由于是在抗战时期,时局不安,这些论文流传不广,难以寻觅,逐渐鲜为人知。现在有机会结集出版,使父亲的研究成果得以保存和流传,并对今天的研究工作者有所启迪和助益,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为此,我很感谢张西平教授对编辑本书的热情关怀;《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时,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教授欣然作序,序文立意高远,言简意赅,情辞恳切,非常精彩。朋友们都认为,用作本书序言也很恰当。经饶先生同意,刊于卷首,谨此说明,并再次向饶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中华书局陈铮先生为使本书更为完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大象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大力支持。

阎守诚

2002年4月10日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录

□ 序	饶宗颐(001)
-----------	----------

□ 编者的话	阎守诚(001)
--------------	----------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001)
------------------	-------

中国与法国 18 世纪之文化关系	(102)
------------------------	-------

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	
-----------	--

——17 世纪末中法文化之关系与 18 世纪之重农学派	(120)
-----------------------------------	-------

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	(132)
------------------------	-------

康熙使臣艾若瑟事迹补志	(149)
-------------------	-------

康熙与格勒门德第十一	(155)
------------------	-------

嘉乐来朝补志	(159)
--------------	-------

康熙与德理格	(163)
--------------	-------

白晋与傅圣泽之学《易》	(169)
-------------------	-------

关于白晋测绘《皇舆全览图》之资料	(173)
------------------------	-------

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	(176)
-----------------	-------

票的问题	(181)
------------	-------

雍正与本笃第十三	(185)
----------------	-------

附:关于毕天祥与纪有纲	方 豪 (191)
苏努补志	(193)
关于麦德乐使节的文献	(197)
碣石镇总兵奏折之一	(204)
澳门史料两种	(208)
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	(212)
解散中国耶稣会后之余波	(218)
《身见录》校注	(228)
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	(240)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270)
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	(285)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①

一、引言

杜赫德(Du Halde)神甫的名字永远和《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书简集》联系在一起。他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一千零一夜》的译者安托尼·加朗(Antoine Galland)的地位相差不远。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不是第一手的;这些知识来自于他的同行们。然而他却很善于选择整理这些知识,以致18世纪的作家们都援引他的作品。

杜赫德当时的工作,正如我们所料的一样,是18世纪前半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研究。这个世纪的法国思想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中国至少是间接地以它与希腊、拉丁、基督教迥异的文明加速了人们思想的转变,对于那些聪明、睿智的人们来说,这种文明不仅是令人佩服的,而且它尤其是理性主义和克己主义的。对于哲学家们来说,能够发掘这种文明该是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啊!

18世纪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些科学家和道德家。继利

^① 本文为阎宗临博士学位论文,用法文写成,1936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全文由北京大学葛雷先生翻译,比利时新鲁汶大学阎守和博士、浙江大学计翔翔教授校。——编者注

玛窦之后,他们以高度的机智和坚韧的毅力来耕耘这块神圣的土地。他们方法上的基本点是:为使中国人民信教,首先他们自己得在文化和语言上成为中国人。而后,在掌握了孔子哲学的同时,他们以为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把中国人置于福音的灵光之下,最后,同当时倾向于积极进取的中国人那样,他们企图用科学征服中国的人心。这种办法是值得称赞与令人钦佩的,它使得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获得研究中国并深入到其文明中去的良机。

但是,这种办法也同样使耶稣会士们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把基督教作为绝对真理,中国人绝不会对它感兴趣。由于拉丁的严格性与中国人的中庸精神相抵触,如果天主教作为来自西方的某种哲学而出现,那它就会如同佛学一样,又存在着失去自身面目的危险。耶稣会士们体验到这种悲剧性的困境。礼仪之争仅仅是两种运动斗争的结果。不管是耶稣教士还是他们的对手,似乎都既不全错,也不全对。

在18世纪,耶稣教教士们以极端欧化的报道而成为拉丁世界追求异国情调的主要引路人。在这个总体思想趋向解放的世纪里,作家们不仅借鉴了他们的事实,而且向他们借鉴了某些与自己思想有关的论据,以至在写作中守旧的文人指责耶稣会士们是为异教徒服务的。假如这些人稍稍想到他们的真正目标,他们的指责或许就不那么激烈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在于传播福音。他们既没有在中国成为纯学者的打算,也没有取悦于他们在法国的同胞的意图。

可以肯定,耶稣会士们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任何人要谈论中国,即使在现在都必须求助于耶稣会士们写的东西,特别要借助于杜赫德神甫的《中华帝国志》。在这不朽的著作面前人们思忖着耶稣会士们是否真的了解了中国,依我们看来,他们介绍的知识值得相信,但也是些经验主义的知识。可以说耶稣会士们把中国拍摄下来,但不是画下来。这里有很大差别。维厄尔(L. Wieger)保证说: